

TSA爭議(一)：應減少操練，但取消TSA非對症下藥



為監察全港學生能力跨年的變動，香港小三、小六及中三學生須參加一個TSA考試。因為得分不影響學生個人校內成績，所以對學生是零風險。

不過一些學校過分操練學生，近日有家長群組在網上發動，要求取消TSA。

令人擔心的是部分公眾分析流於表面。一些家長甚至建議，應該復辟中試，「更公平地」以學生個人公開成績派位。要是這樣，操練不百倍上升才怪呢！

為讓家長真正了解及深入探討這些問題，我希望用一連四天的文章，提供一些背景資料及分析，供關心孩子的家長參考。

富裕社會 醒覺過分操練的害處

社會富裕，一些中產、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，就好像網上聯署的家長，開始醒覺學校的過度操練不但無益，而且破壞小孩健康快樂成長，甚至可能損害孩子日後的學習興趣及能力。

這看法大致上獲得教育界人士(校長、老師、教授、教育局等)認同。

不過家長也是矛盾的，為了孩子能考進著名中學，獲取大學學位，有更好的事業前途，就算心裏十萬個不願意，仍是將孩子送到操練多的學校。認為這

些學校較勤力及認真。

揮之不去的升讀名校壓力

學生承受重大的學習壓力並不是香港獨有，在不同教育研究中，亞洲教育體系常被詬病。

韓國、中國、日本、台灣等家長關注孩子教育是優點，但他們望子成龍，也導致校內、校外補習之風盛行。韓國小孩晚上若能早於七、八時前回家，算是幸運。

學生壓力的形成，部分來自文化因素，部分源自經濟因素。對家長來說，孩子獲取著名大學的專業(如醫科、法律)學位，仍是爬升社會階級的不二法門。

此外，很多學校都希望擇優而教，吸引更多家長報讀，家長願意小孩勤加操練，以便有更大機會進入名校；學校也樂於配合，以保證學生在升小學、中學及大學的過程中，他們學校的學生能獲取更佳成績。

加班加點補習，狂操猛練不但在中學、小學，甚至幼稚園，都已發生，歷來如是。操練風氣，不是有了TSA後的新生事物。

爬升社會階級

其實家長對是否減輕學生壓力的態度與行為，也是極為矛盾的，頗多家長一方面投訴學習壓力太大，另一方面卻將小孩推向功課多、補習多的學校，這是

因為他們深信練習愈多愈好，操練更多，升讀名校，成才的機會便更大。

家長態度及行為的分歧，部分來自各人經濟資源的差異。試想想：若全中國的大學都變成清華或北京大學，或者所有家長都有辦法，將未獲理想大學錄取的小孩，送到國外升學，那麼這升學考試的壓力自然大大減少。

家長內心矛盾

眾所周知，內地升學壓力更大。家長在考場門外攔阻重型車輛經過，以減少噪音干擾子女考試；學校替學生集體打點滴(靜脈注射)去提神等，這些誇張做法，屢有所聞。

家長雖然態度上支持學生減壓，但又恐怕自己孩子落後於人，行為上卻不一定表現是支持減輕孩子壓力。

我能夠體會不願減輕孩子壓力的家長，他們在想：要是我的孩子練習不夠多，萬一不能升上更好的大學，誰來改善他們的生活。這些家長心裏雖然千般不願意強逼子女，但一想到要升讀名校，便又希望學校多給功課及課後補習。

民意也能逆轉

當學校「樂意」配合家長去操練，要推行減輕考試壓力的措施，往往便得來自政府當局；可是，民意永

遠是分歧且很容易逆轉的。

約十年前，南京政府明令禁止學校在周末、假日補課等。不過，行政指令實施後，南京高分數下跌，升讀全國著名大學人數減少，社會反響甚大，部分家長甚至將小孩送至鄰近不設禁制補課的學校。

學校建立盡責形象也配合家長操練

學校其中一個部份者是家長，學校要配合家長意願，在家長心目中建立盡責、勤力的形象更為重要，這樣才保證並吸引更多學生申請入讀。

尤其是當人口下降、學生來源減少時，一些學校仍公開地加班加點操練，這手法一定是在滿足頗多家長的願望，增強他們孩子入讀著名中學的機會。

學校不怕「趕客」，驅走熟知校情的家長，可見家長對甚麼是「過多」操練，仍是各人有各人的標準。我們或許認為是不專業的過度操練，原來在頗多家長心目中，是評價學校的「加分」項目。

從上述分析可知，家長們的期望不盡相同，他們的態度與行為也不一致。再者，每名學生補習及額外練習的需要亦差異甚大，要求政府簡單訂立條例，例如，星期六、日不能補課，不一定容易。但願校長、辦學團體，多聆聽他們家長的意見，制定既適合校情，又符合專業的安排。

(四之一)
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卓敏講座教授 侯傑泰

TSA爭議(二)：監測重要 常用於扶貧 對全港有利



監察不同年級、跨年份及不同類別學生的成績改變，就如檢測血壓、血糖、血脂等健康指數，是所有國家都希望建立或已在進行的教育評鑑系統。

監測的重要性

美國在1960年開始建立它們的NAEP(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)來評量全美學生的教育水平，香港亦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建立學科測驗(HK Attainment Test, HKAT; TSA的前身)，小學一年級至中三，每級均設中、英、數測驗，算是先進單位。

到了這個年代，不單止西方國家，甚至非洲多國，或太平洋的小島國(如斐濟(Fiji)、圖瓦盧(Tuvalu))也設立教育監測系統。

因為如要了解教育在不同階段所產生的問題或成效，便由較低年級開始，所以大部分系統都由小學生開始進行監測，有些國家甚至一、二年級學生(如芬蘭小學一至六年級)也參加。

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國家，甚至已有巨大考試壓力及極多操練的韓國及日本(部分省份)，在完成這些監測後，都會向公眾公布各學校的成績，提供學校排名榜。

相對來說，香港教育局過往只向學校提供達到基

本能力的達標人數百分率，實在是十分「體貼」及「低調」的了。直到去年，在優化措施出台後，甚至不向小學提供達標百分率，如此看來，對學校的壓力可說是微乎其微。

監測往往用於扶助弱勢社群

內地近年也投放很多資源，參考世界各地(包括香港)建立的教育質量監測中心。很多時候，有了全國各地學生各級成績的表現，知道哪些學校有所不足，就如貧窮線的建立，國家之後要面對的，就是如何改善表現較差的地方的教育，提供援助。

所以對中國及其他國家而言，完成監測的下一步，往往就是投放資源做扶貧，也是政府勇敢面對社會差異的起點。雖然監測各省市教育部門的表現，可能引起如香港學校類似的操練，但如缺乏數據支持，我們的扶貧工作是否足夠，便會無從得知。

薄弱學校更需要監測

頗多專業、中產人士、學者等，經濟資源足夠讓孩子各展所長，也不希望將孩子「逼瘋」了，他們也樂意四出推銷這思想。

政府不監測，中產專業人士當然有時間及能力監察他們子女的學校，甚至用腳投票，改送子女到其他學校或海外升學。

可是那些忙於工作的低下階層，要是缺乏政

府這類監測系統，便只能望天打卦。從這個角度看來，更需要政府監察的，似乎是弱勢群體學生更多的薄弱學校。

進行監察政府不是獲益者

公眾不要誤會，進行監察是所有政府的樂事。舉例來說，參與國際大型監測系統的政府，也要巨大的勇氣及承擔。

美國在大型PISA(一項集數十個國家的15歲小孩學習能力的比較研究)中，表現令人失望，在美國本土，教育部長Duncan就已經多次整天坐在學術研討會中，受學者、其他表現較佳國家代表，「教訓」他如何改善美國教育。要是美國退出PISA，Duncan肯定樂得清靜。

我也聽說在PISA研究中，學生表現很差的另一個大國，每次PISA公布結果，他們的教育部長總是很不高興地將結果塞進抽屜裏，看也不看。

監測總是會暴露了系統內大大小小的各類問題，也是要求政府扶貧助弱的依據。很多事物總是雙刃劍，有利亦有弊。綜觀來看，甚至結合亞洲的經驗，有監測仍是比沒監測好。

問題核心：升上著名中學的競爭

既然TSA對學生是零風險，教育局也不發學校排名榜，那麼操練壓力由何而來？讓我們重溫過往數十

年，香港小學生操練壓力的變化。

1977年及以前，小學生是憑自己在一次公開的升中試(1962年前稱小學會考)成績，決定派位先後次序。因一試定生死，故壓力之大，可想而知。

自1978年開始，學生改用五年級下學期及六年級全年校內試成績，作為派位先後次序依據。但是各學校試卷難度及評分鬆緊不一，故此所有小六學生必須參加一個公開的學業能力測驗(Academic Aptitude Test, AAT)，作為調高或調低各校成績的依據，再作派位。

AAT刻意不考核課程內容，試題較像推理測驗，而考試成績也不算在考生個人成績上，只用於計算及調整學校下一屆學生的成績，所以對學生壓力大減，也獲得社會讚賞，相傳這傑作出自當時的教育署署長李超哉。

不過家長對壓力的定義及想法也隨時代改變，到2000年教改討論時，升中考試壓力問題又再提上議程。

當時任教統局局長的羅范椒芬更憂高人膽大，憑理想去改革，在還沒有替代方案之時，亦不理會最終能否有實際可行解決方案之情況下，宣布取消學能試AAT。

升中學的操練壓力，其實是不斷減少中。

(四之二)
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卓敏講座教授 侯傑泰

TSA爭議(三)：家長是「老闆」升中派位才是問題核心



2000年教改，時任教統局局長羅范椒芬宣布取消學業能力測驗，以減低學生操練壓力。在這多元化的社會，當然有人反對取消學能試；也有一些人甚至支持升中試復辟，及建議將學生分為更多組別(當時為五個組別)。

五能力組別改三組以減學生壓力

當時我也參與教統局的內部研究，探索採用學科能力(Hong Kong Attainment Test, 後改稱全港性系統評估TSA)替代，發覺用學校兩、三年的平均成績，已甚為穩定可靠。

此外，我們亦研究將五個派位組別改為三個，降低考試成績的重要性，從而減輕學生的壓力。

教育議題，公眾人人均有經驗，個個都是專家，且意見紛紜，當時亦有教育界人士反對，他們恐怕班中能力差異太大。當時我在報章撰文支持改為三個組別，被罵「誤導、無腦」。

對改為三個組別，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。一些家長認為孩子怎樣努力，也與鄰家不努力的孩子機會相等(100人中，第1名與第33名派至名校機會相等)，這不符合優勝劣敗的原則，也極為不滿，甚至倡議應由五個能力組別改為25個組別。

改為三個能力組別仍未足夠

社會在變，若果三個能力組別，未能達至我們減輕學生壓力的目標，公眾應該討論我們是否應該採用兩個能力組別，甚至完全用攪珠或採取就近入學的方法。

當然就近入學是一個影響深遠的課題，也有其他犧牲及代價，例如一些地區(如九龍城)歷史性名校較多，便可能導致某些地區的樓價因而上漲，一些家長會認為中產者有後路，能送子女出國，但窮家小孩卻不能靠努力，入讀首選志願的學校，這也可能會增加社會怨憤。

要減輕學生壓力，以取消TSA為目標而不去處理升中派位，是徒勞無功的。

就算用於問責，亦是國際習慣

一些人認為教育局利用學校TSA成績向學校問責，是問題所在；但是，我希望指出這並非導致學校操練的主要原因。再者，使用大型評估系統，監察學校，向學校問責，也是國際的慣常做法。

受家長歡迎才是壓力

在香港，教育局從來不向公眾公布及表列各學校的TSA成績，若學校真的因為教育局的閉門問責而瘋狂操練，那麼只有少數成績較差的學校才有操練壓力；但現在成績高低的學校也可能在操練。

再者，教育局也不能以學校TSA的成績不好為由，少派兩班學生到某一學校。學校能收取多少學生，是學校在家長心目中的受

歡迎程度所決定；家長才是學校的「老闆」。

國際間重視問責

我常戲謔說，教育局官員與學者所參與的學術會議，內容經常差別甚大。學者提出的各種新措施及改革建議，往往涉及大量經費，彷彿政府有無限的資源。

另一邊廂，在各國政府互相分享的會議中，他們更多談論的是：政府以倍數增加投放資源，往往不見實效；各政府互相告誡，沒有監察及問責制度，再多的資源也是徒然的。

很多人都推崇美國教育，他們在2001年也引入更多考試及加強問責文化。在「不讓一個孩子落後(No Child Left Behind, NCLB)」法例中，每個州要訂立多個年級學生學業水準的及格線，並進行監測。表現差劣的學校雖可得到支援去改善，但改善無效的學校將被勒令關閉或被接管。

這個以考試、監測來問責的制度，受到很多教育學者批評，但布殊總統卻得到眾議院支持，反映有極大民意同意這改革的方向。

逐漸接受問責的貢獻

美國教育研究學會(AERA)的周年大會本是教授們討論學術的地方。但NCLB通過後，每有學者發言聲討，便有全場拍掌表示支持的場面，比比皆是。學術研討會變成口號式的群眾大會，讓憤於理性討論，可見教育學者們多痛恨NCLB。

屬了十多年，雖然2013年教育部長Duncan到AERA演說，仍有少數學牌背站的學者示威，但在近十年，情況已大有改變。

美國用了考試監測學校，有落第的，當然也有表現優秀的地區及學校。

例如，全美國謀殺率第三高的城市奧克蘭(Oakland)，因為教區及學校改善卓越，便被邀請在某次AERA大會分享經驗，參與者都小心聆聽，氣氛融洽，落後的學校及區域雖然心裏不好受，但也希望取經改善。

香港學生壓力與學校問責制度無關

回頭看一看香港教育局在TSA的報告方法，過往只對學校提供一個達標的百分率，從來沒有向公眾提供學校排名榜。

相對那些西方及亞洲國家向公眾提供學校排名榜，或與美國利用學生考試成績殺校，香港教育局的做法與「全面用TSA問責」相距甚遠；更難以此推論「問責壓力導致學校過度操練」，也無法得出「廢除TSA可減學生壓力」的結論。

要有一個面面討好，不增加學生壓力，不用向任何人問責，而又能受政府、學校、老師、家長、學生擁護鼓掌的改革，只有夢境世界才能發生。

(四之三)
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卓敏講座教授 侯傑泰

TSA爭議(四)：試題深淺應由專業決定



按道理來說，只要學生參與測驗，我們可以製作不同持份者的成績表。

對個別學生，我們能夠提供每一個參與學生的成績表。我們亦可以計算整班學生的成績平均，得出每一班的成績表。

不同層面的報告

我們進一步將校內各班成績平均，更可得學校成績表。最後，將全港學校成績平均，便得到教育局長的成績表。

一般來說，各國監測系統不向個別學生派發成績表。對於是否發放每班個別老師的「教學成績」，爭議頗多。美國確有城市，按老師任教班級表現而頒發獎金；這當然也引來很多爭論。

至於每州(省)、市、個別學校成績是否達到既定的標準，及如何發放各單位的成績表，每一國家的處理方法未盡相同。

顯而易見，動員那麼多人力物力，每年只報告一個全國(或全香港)成績，例如今年86.3%，去年86.0%，是一個粗糙、未物盡其用的系統，故此每一國家(地區)對監測系統所得的數據，都進行更細緻的分析。

監測系統不能全用淺易題目

2000年教改討論如何改善學能測驗(HKAT，即現在的TSA)時，部分人士希望減輕學生應付考試的壓力，故將題目局限於最基本的範圍。

這看來合理，但綜觀各國同類大型評估系統，這不能導致有效監測的目的，因為所評估的範圍欠全面。

從測量學的專業來說，中等難度，即一百名學生中，一半人答對，一半人答錯的題目，最能敏銳地監測及反映學生能力的變化。

為了監測學生群體中，能力較高或能力稍遜(資優、有學習障礙或新來港等)學生的學習情況，我們亦可能刻意加入對大部分學生都算十分艱深，或十分容易的題目。

因為監測系統不提供個別學生成績，即是說，TSA對學生是零風險，所以學生也毋須理會題目是否考如何造火箭、核子彈，反正其他同學也不懂。

此外，考題較深，得分很低(如10分)便可以達標及格，考題較淺，可能接近滿分(如90分)也未算達標。

題目深淺由專業決定

由上述分析可知，監測系統題目深淺是一

個專業的決定，因達標線已定，亦用統計方法按題目難易而調整，故此，改用較難或較淺的題目，不會提升或降低學生的及格機會。正因如此，老師及學生只須按課程授課及學習，毋須理會TSA題目的深淺。

對於監測題目的內容種類，我們曾經用與科目無關的學能(推理)試題，也用與學科直接有關的試題(Pre-S1香港學科測驗，HKAT)。

其實對某一年級某一科目，不理會考試名稱，可考核的內容近似。TSA成績雖然對學生是零風險，但是一些學校及出版社假借TSA為名，操練學校內課程的中、英、數教學內容；有時甚至採用坊間一些質素差劣的練習。

故此，就算取消TSA，學校及出版社總能想出另一個名目去操練，達致吸引家長，改善收生或推銷練習本的目的。

總結而言，公眾、老師及家長需要多一點教育測量學的知識，而不應隨便要求命題主任採用過淺易或某些指定內容的題目。

如何解決目前困局

不同家長對甚麼是適當數量的練習，怎樣才算過多，也難有共識。統一家長間想法的差異，以及改變他們的心態，不是數天便行，而是一項跨世代的工程，無法一蹴而就。

環觀鄰近地區，內地、台灣升讀初中都是就近入學。只要香港家長們有足夠共識並且願意，就算升中派位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系統，我們可以作一些討論；也讓校長、老師了解家長的願望。

對於一些小學盲目以補習操練等方式，過度操練學生，我們希望校長及老師在聆聽家長的關注事項之餘，能用議會共識簽約等專業方法處理這個問題，甚至表列公布各校補充練習的數目。

可是，假若自律失效，教育局的行政干預可能是無可避免的。不過，要制定既符合各學校個別情況，又全港學校都適用的一套標準，並不容易；所以由政府訂立條例，是無可選擇中的下策。

解決學生壓力問題，要對症下藥。操練的主要原因還是為了爭取更好成績升讀名校及入讀大學；因此，取消TSA也不能解決問題，且會破壞香港五十年來艱苦建立的監察系統，大家應再三思量。

(四之四)
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卓敏講座教授 侯傑泰